

文史资料选辑

1980

第一辑

6

2: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 王有为
封面装帧 范一辛

文史资料选辑

1980年第一辑(总第二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25 字数 116,000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4,200

书号 11074·434 定价(六) 0.52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 ✓接管上海，保卫上海梁国斌（1）
- ✓伪警察局里的斗争黄 旭（13）
- ✓衣着业职工迎解放鲍士用、徐近灏、汪铭昌、宁 武（19）
- ✓回忆沪西地下军高 骏（28）
- 一场严峻的考验丁祖宪（42）
- ✓原资源委员会驻港员工起义吴志翔（48）

- ✓回忆孙中山先生住在旧金山我家温徵德（58）
- 我的诗和字柳亚子遗著（72）
- ✓以身殉报的邵飘萍先生郭 根（76）
- ✓廖克玉老人谈瑞澂许 寅、王 铿（94）

- ✓立信会计学校的创办和发展潘序伦（104）
- ✓昆仑影业公司几件事吴 茵（120）

- ✓旧上海外商银行买办~~吴培初~~遗著（127）

接管上海，保卫上海

梁 国 斌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人民解放军继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遵照毛主席发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战斗号令，以雷霆万钧之势，胜利突破长江天险，如同迅猛异常的风暴，席卷蒋家王朝。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接着分路南进，势如破竹，五月二十七日就解放了上海。

一九四八年底，我在华东局社会部主持日常工作，华东局领导同志指示我们着手准备京、沪、杭解放后的接管和组建公安机关等工作。徐州解放后，我检查了徐州接管城市的保卫工作情况，并参加了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召开的全军保卫工作会议，代表华东局社会部向到会的同志介绍了新解放城市敌特活动的特点规律，对打击敌人，防止破坏，保护敌伪档案材料，搜查散兵游勇，保卫人民利益等工作作了部署，动员各军保卫部门做好接管城市的思想上政策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当时从接管济南、济宁、徐州等城市工作的经验看，在我军事上歼灭敌人，进入城市以后，公安保卫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彻底摧毁反动政权和敌人用以维护统治、镇压人民的各种反动组织，打击敌人阴谋破坏活动，迅速建立革命秩序，维护社会治安，恢复生产。我们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动员各方面力量，广泛搜集敌占区敌人军、政、党、团和各系特务组织及其活动的情



陈毅同志和刘晓同志在检阅台上 （梁国斌摄）

报资料；训练公安干部，作为组建城市人民公安机关的骨干力量。同时，针对新解放城市的新情况，研究对敌斗争方针、政策、策略上可能遇到和应该注意的重大问题。对上海这样一个闻名世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期法西斯统治，工商业集中，交通比较发达，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大城市，要把它接过来管好，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从各方面切实做好准备工作。

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是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在华东局陈毅等领导同志关怀下进行的。一九四九年初，我们派了一批干部，携带电台，前往沿江一带，开展敌占城市的情报工作，搜集敌

人防御设施、装备、部署等军事情报，还把审讯战俘，整理缴获的敌档文件资料，以及敌占城市我地下党组织获得的敌人党、政、军、宪、特的组织系统、“应变部署”等情报资料，分别整理汇编，掌握敌人动向，研究布置进入城市后的对敌斗争措施。

华东局为了接管上海，组建公安机关，从各方面选调了大批干部，其中有华东局社会部和华东军区保卫部的，有山东济南和昌潍地区的，还有从其它地区选调的。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初，先后到达江苏丹阳集中时，已有各级公安干部二千余人。大家情绪高昂，干劲充沛，夜以继日地学习文件，研究情况，在思想上、政策上和材料上进行准备。

由于我军连战告捷，形势发展迅速，要求我们必须抓紧干部训练。有的干部不能住下来学习，只好从苏北淮安至苏南丹阳途中，边行军边学习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和《入城守则》。在丹阳时，我们曾将准备工作向邓小平、陈毅等领导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十分关心干部的学习。陈总亲自给我们作报告，讲述解放战争形势，指出上海的解放是个伟大的变革，它将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在国际上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要求广大干部进城后，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致，接管上海，保卫上海，建设上海，把这个“冒险家乐园”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为人民造福的新上海。还说：你们干公安工作的同志负有更重大的责任啊！他在讲到入城后工作作风要谦虚谨慎时，非常亲切而又很风趣地说：同志们，我们要把上海建设成为东方的社会主义的文明的城市，是很不简单的，我们都是野战军啊，管理城市是一门科学，我们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讲究文明，注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可不能到城市里去

搞“野战”了。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起模范带头作用。他的报告给我们以很大的教育鼓舞。

有一次我向小平同志汇报时讲到，入城后要对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宪兵、特务人员等办理登记管制工作，他指示我们，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政策，注意斗争策略，打击首恶，分化瓦解敌人。对国民党党、团人员的登记，要注意上海的具体情况，此类人员数量大，涉及面广，而我们进入城市后，工作多，精力有限，登记范围可缩小到区分部委员和分队长以上的骨干分子。他并要我将他的意见电报中央社会部。社会部采纳了小平同志的意见，使对敌斗争做到稳、准、狠，这在解放初期尤为重要。因此我们把原来已印好的布告修改重印，组织干部反复学习“约法八章”、《入城守则》、接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领导同志的指示，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我公安部门的接管对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机构设置、警种、装备分布以及国民党军、政、警、宪、特的情况，制订了接管工作和开展对敌斗争的具体方案。

五月二十日左右，在丹阳城附近的一座庙宇里，召开了干部大会，我和李士英同志分别传达了华东局任命我和李士英等同志任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部长、副部长的决定，以及我们进入警察局以后接管各处、各分局主要负责干部的名单，并再次把上海解放后的对敌斗争、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族工商业和恢复生产等有关方针政策，进行了动员教育。实践证明：在入城前做好政策思想、纪律作风和干部训练上的充分准备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是维护四大家族反动统治、镇压人民的罪恶工具。总局设有刑警等处，直辖两个保安警察总队和骑警大队、飞行堡垒大队。它们的武器装备除长短枪、迫击炮外，还有装

甲车、小型坦克。各区分设三十一个分局，共有官佐、警员、职工、技术人员等二万五千余人，并建立了庞大的义务警察和严密的保甲制度。此外，还有中统、军统等各系特务组织，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制造白色恐怖，凶狠地残害人民。警察局长毛森，这个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杀害了一大批革命同志和人民，他在对少数亲信作了“应变部署”后，于五月二十四日潜逃。在逃跑前，他委派了在租界巡捕房混事二十多年的陆大公任代理局长，维持残局。当时，警察局系统我地下党组织，遵照上级党的指示，已作了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部署。特别是市中心区的几个分局，他们组织了保管委员会，加强武器、弹药、文件档案的保管，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争取一般员警、职工，各安职守，迎接解放。各工厂、企业在中共地下党市委领导下，组织了人民保安队，进行护厂斗争，这对粉碎敌人在覆灭前破坏电厂、水厂、市政交通设施的阴谋，起了重大的作用。

五月二十七日，我们带领干部队伍由丹阳进入上海。有的同志乘火车，尽管车厢上弹痕累累，连坐位也没有，有的干部坐在四面无窗的货车厢里，虽感闷热，但比起靠光脚板同敌人卡车“赛跑”的急行军来说，已算是很舒服的了。一部分干部在北站铁路局大楼待命。我们几个同志，先进入福州路警察局北部五楼的一个纸片满地、几只椅子横七竖八地倒在地板上的一个办公室里，听取了“打前站”的干部和警察局内部我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邵健等同志的汇报，决定召见警察局代局长陆大公等人，向他们宣布军管会公安部接管命令，接管干部分别进入总局各单位和各分局，开始接管。接着，在交通大学大礼堂召开全体接管干部和地下党同志会师大会。

鉴于上海是个工商业集中的大城市，公安工作每日每时都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要求我们坚持边接管，边工作，不能稍有停顿，千方百计地做到接而不乱。我们进入各接管单位的干部人数不多，情况不熟，又缺乏大城市的工作经验，工作上势必会遇到不少困难。我们要求各级领导坚持对广大干部进行公安工作是党委领导，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专门机关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传统教育，要求干部发扬我党公安保卫工作的光荣传统，在实践中学习，大胆工作，总结经验，分别不同情况，把工作落到实处。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迅速恢复生产，入城后的工作重点是打击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的混水摸鱼，冒名接收，危害人民，捣乱破坏，坚决及时地打击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

对市区各分局人员没有被打散的单位，我接管干部依靠地下党组织和靠拢地下党组织的积极分子，广泛宣传《约法八章》，特别是讲解对旧警人员的政策，安定人心，稳住内部。对交通、消防等技术性单位一般的警员、职工，将他们迅速组织起来，一面教育，一面让他们值勤巡守，维护交通秩序，号召他们为人民立功。对处、科、股长、分局长、巡官等，讲明政策，晓以利害，责令他们各按职责，办理交代，如有玩忽、捣乱者，定将依法惩处。并吸收地下党推荐的积极分子，从旁监督清点，做到接而不乱。

对战斗激烈的近郊地区被打散的单位，各接管工作队积极查找散失人员，通过各种关系，派人联系，通知他们回来报到。大约只用了几天时间，除少数劣迹昭著、罪恶严重的分子外，各分局人员基本上都回来报到，听候录用，较顺利地开展了接管工作。

但是不少旧警人员，由于他们长期在国民党控制下为反动统治服务，欺压人民，对我党政策疑虑颇深，背后传说纷纷。有人说：

“《约法八章》虽好，能否兑现，还要看一看”，“南京的留用警察已被强制编入人民解放军，送往前线”，“旧警已在丹阳集训，一天只供给两碗稀饭”，“老婆进工厂，孩子送托儿所，取消小家庭”，“要改供给制了”，等等。在新建的公安机关内部，表面上看很平静，实际上却动荡不安。而稳定内部人员的思想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十分重要。各级领导化了很大的力量，深入到旧警中去，了解思想动态，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党的政策。我和李士英同志向陈毅同志汇报工作时，讲到了这个情况，陈毅同志非常重视。他指示市公安局于六月八日上午在天蟾舞台召开员警代表大会，陈毅同志亲自到会讲话。他告诫国民党旧警察局人员，要拥护人民政府，安心工作，政府根据表现，一面录用，一面教育，有功者奖，犯罪者罚，决不让一个要求为人民服务的人，没有工作的机会。但对不愿悔改，企图利用人民政府宽大，从事潜伏捣乱的人，则当惩罚。他还号召大家努力学习，反省自己，迎接光明，为人民服务，争取立功。这个大会在留用人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把见到陈总，听了报告，引以为荣。有的说：“陈军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真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有的说：“陈军长讲话气派大、眼光远，听了他的话感人肺腑，可敬、可亲。”大会对安定员警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整个接管过程中，从警察总局到各分局以至基层派出所，没有发生重大破坏事故，顺利地完成了接管任务。接着，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对留用旧警人员的审查和教育，纯洁公安机关内部等工作。

我军进入市区，纪律严明，露宿在马路两旁的人行道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人们赞不绝口，说这是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好军队，真是兵强马壮，秋毫无犯，人民的子弟兵。男女老少成群涌向战士们，问寒问暖，亲切非常。为了让更多的人民群众见到英雄的

战士们，共同庆祝上海的解放，攻城部队举行了入城式。部队由北郊方向进入市区，步伐整齐，军容威武，炮兵的大炮昂首指向天空，坦克马达轰鸣，人民群众在马路两旁，向战士们鼓掌欢呼，纷纷把写好的“向解放军致敬”等标语贴在大炮和坦克上。陈总等首长站在司令部大门口临时搭建的检阅台上，露出胜利的微笑，向战士们挥手。这是多么威武，多么雄壮，多么鼓舞人心的情景啊！我虽然和陈总等首长在一起开会，向他们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已不是十次、八次，但从没有这次那么激动，我情不自禁地取出照相机，也来不及考虑选择更好的角度，就掀动了照相机的快门，为陈总等领导同志摄下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照片。多年来，每当我再见到这张照片，回想陈毅同志的音容笑貌，使我浮想联翩，向他汇报工作，听取指示的往事一一涌现在心头。这个入城式举行了整整一天，不仅让广大人民群众看见这些英雄战士，就是他们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全中国，也是他们保卫着人民的胜利果实，建设美好的未来；同时向那些不甘心灭亡的一切反革命残余势力，发出了严厉警告，推动了我们的接管工作，支持了人民公安机关的建立和对敌斗争的开展。

迅速恢复交通秩序，为生产、运输安全服务，这是党和上海人民给我们公安战线广大干部、民警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上海是个工业生产集中的大城市，生产恢复的快慢，生产多少，都和国计民生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在我人民解放军攻占城市的前夕，作了种种阴谋策划，妄图破坏工厂，特别是水、电厂，爆炸桥梁，造成上海瘫痪，让我们接收一座“死城”。由于党的正确领导，依靠工人阶级和全市人民，敌人的这个阴谋被彻底粉碎了。但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交通秩序混乱，严重影响城市秩序

的建立,妨碍生产和交通运输安全,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单说人力车之多,是上海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的特色之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警察千方百计压迫人力车工人,榨取他们的血汗,因而他们痛恨旧警察,这是理所当然的。解放了,解除了劳动人民颈上的枷锁,一些车工不服从警察指挥,说什么“解放了,你还来管我们”,“交通规则是国民党规定的,见你的鬼去吧!”人民这种厌恶反动统治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不遵守秩序的行为,对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也是很不利。警察是一种什么状况呢?他们一面已经佩戴上“上海市人民警察”的符号或袖章,觉得对付三轮车工人“剥号衣”、“撬牌照”、“扣车子”那一套不行了,国民党的一切法律,包括他们过去当作“紧箍咒”念的《违警罚法》已被废除,失去了效力,而另一方面我们的新法律、新规章还没有制定,因此他们不敢多管,眼开眼闭,束手无策。也有的出勤不出力,消极怠工,看我们的笑话。而马路上行驶的车辆,有党政军民的,也有国民党在溃逃时丢下被人偷走的,真是五花八门,鱼龙混杂。陈毅等领导同志指示我们大力开展宣传工作,要求广大干警懂得为了人民必须依靠人民的道理。市公安局在成立不到一周之内,发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交通规则》(六月二日成立市公安局,李士英、杨帆等同志任局长、副局长),陈总还命令警备部队,在交通干线、十字路口,加派岗哨,配合民警指挥交通维护秩序。同时通告党、政、军机关,对所有人员特别是驾驶人员进行教育,要听从交通民警指挥,违者以军法论处。当时发生了一起解放军某部驾驶员在市区高速行驶车压死行人的交通事故,陈总得知后下令彻查,对肇事者以军法严惩。此事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强烈反响。有人作了今昔对比说:解放前的上海,不仅国民党的军、警车辆,就连帝

国主义分子的车辆，也无视我人民生命安全，横冲直撞，肇事后扬长而去，习以为常；今天一个解放军战士因道路情况不熟，驾驶技术不高，误伤人民，受到惩处，共产党真是言出法随，执法如山。但不少人又觉得肇事者并非故意，这样处理似觉过重，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各界代表前往军管会，求见陈毅主任，陈述己见，为驾驶员说情，请求从宽处理。而且说情的人越来越多，连受害人家属也来了。陈总等领导同志最后采纳了各界人士的意见，作了从宽处理，但严格要求党政军机关对内部人员进行遵守法纪的教育，考核驾驶人员，没有十分必要的卡车不准进入市区。经过这样内外的宣传动员，干线输导同岗点指挥相结合，多管齐下的整顿、管理措施，交通秩序迅速改变了面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赞扬。有人指着马路上的交通民警说：“昔日是警察人民，今天是人民警察，谁说共产党管不了城市啊！”

蒋介石为维护其反动统治，除拥有庞大的军队、警察以外，还有各派系的特务组织。我们要教育干部充分认识坚决摧毁那些反动组织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同时又要区别对待其成员。那些反动组织都是国民党政权赖以生存，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工具，肃清反动势力，彻底摧毁它，是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任务，丝毫不能含糊和手软。但是，对这些反动组织的成员怎么办，涉及到对敌斗争的政策、策略问题，必须谨慎从事，不可粗心大意。我们坚决按照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分别对待的方针，进城后对中统、军统等反革命组织宣布为非法，其机关、档案、资材一律查封，予以没收。对胆敢继续活动者，依法严惩。首先逮捕了一批首恶分子，同时，采取专门工作与依靠群众相结合的办法，积极开展调

查研究和深入的侦察工作,破获了一批敌人潜伏的特务组织,缴获了一批电台、武器,打击了敌人。对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成员的登记工作,按邓小平同志指示,经中央社会部同意的登记范围,在接管过程中积极进行调查研究,抓紧准备工作,在社会秩序进一步稳定,情况更加明了,我各级公安机关进一步组建就绪后,再开展登记工作。

反革命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从多方面捣乱破坏,妄图作垂死挣扎。当时一些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冒名劫收,敲诈勒索,打起什么“民主党派”、“江南纵队”、“华东地区先遣队”等等旗号,已查获的就有二十多种。有的公然持枪抢劫,在我们接管的头二十多天里,发生重大抢劫案五十多起,当场捕获匪徒五百余人。九江路上有个证券大楼,那里聚集着大批奸商、掮客,他们错估了上海解放后的形势,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操纵上海金融市场,散布什么“共产党打仗有本领,管理城市不行,搞经济更是外行”,成千的银圆贩子,从那里领得“行情”,在南京路等繁华地带叫卖“大头”“小头”(银圆),欺诈骗群众,破坏社会秩序。广大群众对此十分愤慨。我们遵照陈总等首长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取缔的指示,对证券大楼的操纵者及其爪牙的活动情况,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分清了保护正当工商业,恢复发展生产和打击投机倒把的政策界限。经过严密部署,于六月十一日出动警备部队,突然包围证券大楼,查获了大批黄金、银圆、美钞,依法逮捕了为首分子。与此同时,通令各分局出动干警取缔沿街叫卖银圆的流氓、“黄牛”。此举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群众纷纷集会谴责不法奸商,拥护政府措施。

弹指间三十年过去了。解放初期,我主持上海军管会公安部

工作时间很短,在党的领导下,向上海工人阶级,向上海人民学习了不少东西。一九四九年七月,我人民解放军继续挥戈南下,我又奉命进军福建,投入了新的战斗。

回顾三十年来,上海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城市,改造成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军的重要基地。但在这三十年中,也经受了严重的挫折,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把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变为法西斯统治的帮天下,罪恶深重,令人发指。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上海重新走上了正确健康发展的道路。当前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正在深入贯彻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和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深入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肃清“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同心同德搞四化。我能同上海人民一起,在党中央、上海市委领导下,为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四化建设的新长征作出贡献而感到幸福和自豪!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伪警察局里的斗争

黄 旭

一九四七年夏，我毕业于浙江英士大学，因在浙江找不到工作，于同年七月间来上海，由英大同学介绍，在上海市商会绿营联谊社帮助工作。不久，通过社会关系介绍到伪上海市警察局工作，晚间仍到绿营社帮忙，并在该社住宿。

我进伪警察局工作，先派在龙华分局人事室当管理员。因龙华离绿营社较远，经托人设法，调到福州路伪警察总局人事室第三股当科员。一九四九年四月间，第三股股长请假回浙江原籍，由我代理股长。人事室经管全局一万多员警的人事行政业务，下设四股：第一股管员警的任免、升降、调动等事；第二股管员警的考勤、考绩、惩奖等事；第三股管员警的教育训练、人事法规、新进人员考试等事；第四股管理人事档案材料和卡片册籍。伪人事室主任向例系伪局长的亲信，伪局长调动时，人事室主任都跟随调动。一九四九年二、三月间，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毛森调任伪警察局局长，委派了他的亲信周廷洛任人事室主任，各股股长跟着也有些调动。

伪警察总局人事室股长以下工作人员共三十多人，一、四两股各有十余人，二、三两股只有二、三人。这些人员绝大多数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进来的，少数是日伪时期、甚至帝国主义租界时期留用下来的，一般职级低，薪金少，雇佣思想比较严重，终日忙忙碌碌，

小心谨慎，以求保住饭碗，但对当时物价暴涨，生活艰难的社会现实，都有不满情绪。许多人经历过帝国主义、汪伪、国民党三个时期，解放前夕也准备留下来吃共产党的饭。平日我跟这些人比较接近，关系较好，加上伪人事室各股办公室连在一起，第三股的工作又比较清闲，因此，我常站在这些同事的办公桌旁闲谈、聊天。特别是我入党后，在蔡东园同志直接布置下，为了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积极进行工作，首先对伪人事室某些搞机要工作和经管卡档材料的人员，长期而耐心地做“有心人”，经常徘徊在他们办公桌周围，暗中注意他们的工作情况，了解一些特务情报和机密材料。

在此期间，我先后取得：伪上海市警察局政治处调查科（军统特务机构）特务人员名册一份，该科股长以上特务骨干分子人事卡片十七张，复旦、同济、交通等大专院校学生中的特务分子名单一份。在代理伪人事室第三股股长时，曾利用职务上的方便，从总务处索取了一份伪上海市警察局枪械仓库及其储存武器统计；还从造送伪警察总署报表底稿中抽出全市两个武装警察纵队驻防地图及其警力配备统计一份。另外，对在伪上海港口司令部军械处担任抄写工作的亲戚，反复进行启发教育，由他抄出伪上海港口司令部军械库库数及其贮存军械统计一份。以上这些机密材料，都及时交给地下党组织。有时刺探到伪警察局大逮捕行动日期以及敌人的一些“应变”活动情况，也及时向地下党领导汇报。在进行这些工作时，经常利用机会对有关人员进行形势教育，宣传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启发卡档管理人员保管好卡档材料。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午，伪人事室材料股代理股长应宝昌，奉伪警察局长命令，准备烧毁档案材料。我和周围群众一起，向他作了面对面的斗争，制止他执行这项命令，从而保全了包括租界、汪伪时期